

导向原始创新的交往理性：博士后与合作导师的关系范式及其优化

丁建洋

摘要：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是交往理性的生成过程，原始创新导向的理性发展是其关系范式的核心价值取向。当前博士后与合作导师关系范式的优化需要重点围绕主体间关系生成模式的重构、环境支持系统的完善、主体间交往理念和方式的改进等方面进行。

关键词：博士后；合作导师；交往理性；关系范式

作者简介：丁建洋，男，汉族，江苏射阳人，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博士后制度已经形成了培养研发人员的创新能力、师资储备、教师过渡等多元化功能，成为大学、企业、研发部门独立或协同培养高层次科学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博士后制度功能发挥的关键是博士后人才培养质量，而影响培养质量的核心是博士后和合作导师基于合作研究的主体间关系建设。这种合作关系既源于师生关系，又超越师生关系，如何深化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之间的合作关系，提高合作关系的理性化水平，提升合作双方的科学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合作导师的指导作用，促成合作双方做出原创性科学成果，是博士后制度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交往理性的生成过程

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是交往理性的生成过程，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理性的发展关涉到交往主体间关系的建构及其环境对主体间关系的支持。考察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交往理性的生成，就要分析大学师生主体间交往的媒介、交往关系的发生与发展过程。高深知识是大学运行的基本材料，“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①大学师生主体间的交往就是主要围绕高深知识而展开，从知识的运行过程来说，师生交往主要围绕知识的生产、传播以及应用而进行；从知识的运行方式来看，随着知识深奥程度的提高，师生交往与合作范式呈现出不断转型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资助编号：2014M561677）。

^①[美]伯顿·R. 克拉克著，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1.

的过程。本科教育阶段，师生主体间交往主要是一种传播性交流，以知识的授受为主要特征。硕士教育阶段，导师与学生主体间交往范式以传播性与启发性兼具。博士教育阶段，导师和学生之间以点拨性交流为主，往往是师生共同确定研究问题，但问题聚焦、研究路径、研究方式等往往是在导师的指导之下，形成导师点拨-师生共同研讨-导师确定-博士生实施的交往路径。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之间的交往主要是基于难解课题的交流，往往是博士后基于学术困境，提出研究课题，主体间在对话中形成交往范式，即博士后与合作导师研讨和聚焦问题-合作导师参与问题的理论思考-博士后独立探索问题的解决-博士后与合作导师共同反思问题的研究路径与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大学师生主体间交往范式的转型过程本质上是师生交往理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教育阶段交往范式转型的核心是知识规训的逐步消解。“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深’只是程度不同。……这些学问或者还处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交界处，或者虽然已知，但由于它们过于深奥神秘，常人的才智难以把握。”^①所以，知识的高深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师生主体间交往的范式，本科教育阶段由于学生主要处于专业性的未知状态，师生交往的知识需要通过授受性的对话与交往促进学生认知发展，要求学生掌握特定的学科话语体系，规训着学生知识体系的发展方向与内容。从硕士到博士的研究生教育阶段，随着学生对专业和学科认知水平的提高，师生交往方式从帮助学生选择主题到指导学生独立选择主题、从指导学生开展研究到学生尝试独立开展研究，这个过程是知识规训逐步削弱的过程。博士后阶段研究的课题往往处于无人区或深水区，之所以需要合作导师的指导，目的在于帮助博士后缩短或减少在无人区或深水区探索的时间，把握研究的方向与路径，通过主体间合作使双方的研究能力得到提升，特别是能够取得原创科学水平的研究成果。随着主体间的交往在知识规训程度上逐步消解，主体间交往的理性化水平逐步提升。从本科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再到博士后与导师的合作研究阶段，知识的运行以知识传播为主导地位逐渐过渡到以知识生产为主导地位，知识的高深性从以“处于已知与未知的交界处”逐渐发展到“知识生产的深水区或无人区”，这种主体间交往主题的转型与发展使得交往的发展呈现理性化发展过程，交往理性不断地走向深入。在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交往中最为核心的特征就是突破甚至超越了学科规训和话语体系，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学术生活世界中自由探索。

^①[美]约翰·S. 布鲁贝克著. 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

二、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交往理性的发展取向

分析博士后与合作导师学术生活世界的交往关系,通过关系范式与交往理性的阐释与建构可以从宏观上构建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交往理性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其终极旨趣。

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关系范式的建构指向共同破解无解问题。交往范式建立在交往行为方式的基础上,是交往理性的内在旨趣和具体表现形式。哈贝马斯认为“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交往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有三个有效性要求:一是对一个被陈述性内容或被提及的陈述内容的存在性先决条件,他要求真实性;二是对规范或价值——在一个综合的关联域中,这些规范或价值将证明一个施行或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为正当;三是对被表达的意向,他要求真诚性。”^①三个有效性的要求同时相关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交往行为。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师生对话、交流的丧失,教授成为“孤立主体”,成为“自我意识”的工具,陷入工具理性,导致学术生活世界的异化,交往异化、交往失范制约了主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在交往实践中,只要交往双方或任意一方不能以自由、平等、自主、全面发展的主体而存在,主体与主体关系就会在某种意义上降格为主体与客体或物与物的关系,从而使交往走向异化。”^②如何走出交往异化,克服对象化关系,重建博士后与合作导师关系范式,彰显主体间的“言语行为”和“对话”成为大学理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大学师生主体间交往范式的转型来看,博士后与合作导师的交往是大学师生交往范式的一种,是大学师生主体间交往理性发展水平的最高阶段,是从知识传播为主要特征转向共同破解无解问题为主要特征的范式,这也是博士后与合作导师的交往不称为“师生关系”,而称为“合作关系”的缘故,其根源就在于主体间面临着共同的学术困境,所面临的问题都是无解的,需要通过主体个性的张扬、主体优势的发挥、观点的碰撞来提出问题研究的路径,最终由博士后主体独立破解研究的问题。

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的理性发展以原始创新为核心价值取向。交往理性是对主体哲学、意识哲学的扬弃,“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是‘交往理性’。他试图用这一概念来替换传统的理性概念,借此走出以自我意识为标志的主体哲学困境。”^③哈贝马斯把交往理性作为重建现代性的规范基础和生活世界的运行原则,实现了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和交往得到协调一致,从而克服个体主义的弊端,在生活世界的社会化过程中实现了个体化^④。

^①赵淑辉. 21 世纪我国交往理性研究评析,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5): 129.

^②赵淑辉. 21 世纪我国交往理性研究评析,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5): 129.

^③陈嘉明著.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91.

^④陈嘉明著.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84-285.

对于学术生活世界而言,交往理性的旨趣是人的理性的彰显,人的创造力的张扬,通过主体间的互动,满足主体的求知欲,提升主体知识生产的能力。交往是主体间的交往,因此交往理性的发展水平是主体间努力的结果。对于大学来说,交往有其特殊的价值与蕴意,就师生关系而言,从主体-客体关系走向主体间关系是对传统师生关系、师生交往范式的转型。大学中以知识的生产、传播以及应用为主题的交往理性发展有其自身价值与意义,主体间交往意味着学术思想的冲突,包括科学观点、科学范式或技术范式的冲突,蕴含着创新的潜质。如果将自主创新分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再创新的发展层次^①,从知识创新的视角来考察大学师生主体间交往理性的发展大体上呈现模仿水平-模仿创新水平-自主创新水平的发展过程。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关系范式以共同破解无解问题为主要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博士后与合作导师的交往理性是一种自主创新导向,特别是原始创新导向的理性发展,是否具有原始创新是衡量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交往理性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进一步来说,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交往的理性化发展不仅是主体间的建构,同时需要大学、企业、政府等共同构建有利于主体间交往的学术生态环境,包括科研经费制度、学术评价模式、人才晋升与流动机制、科研文化的净化等方面的完善。

三、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关系范式的优化路径

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理性旨在突破传统的主体意识哲学,构建一种主体间“互动”参与为特征、以沟通为取向、相互理解以达成某些共识的交往范式。博士后与合作导师的共生关系源于师生关系,但又超越师生关系,其关系范式的建设需要重点围绕关系生成、关系环境、主体间交往的理念和方式等方面进行。

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关系生成模式的重构。博士后与合作导师共生关系的生成往往源于研究的问题。美国学者司托克斯(D. E. Stokes)提出的“象限理论”把科学研究的“两种目的”——“认识”与“应用”的多种可能用“象限的四重图”来表示,纯基础研究取向的“玻尔象限”研究,应用引起基础研究取向的“巴斯德象限”研究,纯应用研究取向的“爱迪生象限”研究,既无认识取向又无应用取向的“皮特森象限”研究^②。对于博士后研究来说,无论将问题的起始定位于哪一种象限类型,突破常规科学和技术的危机,寻找科学和技术革命的突破口是重要任务。突破口可能来源于基础理论中的问题,抑或可能来源于实践应用中的问题,其关键是能够与合作研究主体的认识兴趣结合起来,找到或接近破解常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06.

^②[美]D. E. 司托克斯著. 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 巴斯德象限, 周春彦等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63.

规科学和技术危机的突破口。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不仅是主体间的沟通，更重要的是，“交往理性与人在相互理解和交流中所具有的认识兴趣联系了起来。”^①这也是交往理性之所以成为工具理性补充的缘故，研究问题的产生方式及其性质往往制约了交往理性的发展水平。

博士后和合作导师主体间关系环境支持系统的完善。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主体面临的环境是建构和制约交往理性发展的重要问题，当前在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交往的环境支持系统建设方面，科研经费资助体系的完善是最为核心的方面。目前博士后的科研经费来源主要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体系，包括面上资助、特别资助、出版资助、国际交流资助等项目；省级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体系，包括面上资助、企业联合培养资助等。目前资助体系凸显的问题是资助方式比较单一，主要采用竞争性资助方式，导致了基于自由的长线研究、纯粹学术取向的基础性研究等获得资助的比例较低。经费资助体系的完善需要着力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建立竞争与均等并行的经费资助体系，当前特别需要强化均等性经费资助体系的建设，为博士后研究人员均等性地提供科研启动基金，支持博士后与导师合作开展自由研究、长线研究、基础性研究，主要通过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完成情况来评估这些均等性经费的使用效益。这方面日本政府和大学所构建的比较全面的科研经费资助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主要策略是分配方式上均等与竞争并行、目的取向上一般目的与特殊目的相辅的框架结构^②。二是建立中后期资助制度，针对具有重要原创性研究和重大项目研究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情况进行中后期资助。通过均等性资助为基础、中后期资助为补充、竞争性资助为主导的资助方式，构建比较完善的博士后科研经费资助体系，为博士后与导师合作开展研究奠定基础。当然，主体间交往的环境支持是一个系统化改革，还需要在进出站制度、评价制度、人才流动制度、科研文化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形成促进博士后与合作导师共同开展原创性科学研究的学术生态环境。

博士后研究人员对主体间交往理念和方式的改进。在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交往关系建设方面，博士后研究人员需要重点改进两个方面，一是提升双方关系属性的理性认识。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关系的特殊性在于其既源于师生关系又超越师生关系。相对于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师生关系而言，博士后与合作导师主体间关系不仅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且还存在着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主体间关系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博士后人员在研究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和独立地位，需要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合作研究过程中张扬主体性特征。二是进一步彰显主体自身的优势。博士后研究人员在身份属性上是进入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起始阶

^①[英]安德鲁·埃德加著. 哈贝马斯：关键概念，杨礼银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25.

^②丁建洋. 学术取向：日本“科研费”制度演进与运行的基本逻辑，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2）：64-65.

段，就独立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而言属于起步阶段，受到学科规训和学科范式束缚比较少，没有形成主体的独立风格和研究范式，还没有形成主体的理论框架和体系，不需要保护主体的独创性观点，这些基础性条件使得博士后对研究的问题“无知”、“无畏”，更有利于对研究问题进行大胆地探索，更有可能取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因此，博士后阶段的研究不但要注重借鉴和提升既有的学术观点、科学和技术范式，更要注重提出原始创新取向的学术观点、科学和技术范式，冲破已有的学科框架、话语体系和基本原理。

合作导师对主体间交往理念和方式的改善。合作导师在主体间交往关系建设方面需要重点改善两个方面，一是充分认识合作导师在主体间交往中的指导价值。当前合作导师在与博士后的交往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指导不足，合作导师的一个常见观点是，博士后在科研方面已经通过了硕士和博士阶段的系统化训练，不需要再进行指导，主要任务应该是完成布置的科研任务，很多情况下合作导师把博士后作为科研劳动力而已。“不即不离”是合作导师对博士后进行指导的一种可行范式^①。“不即”意指合作导师对博士后的科研工作不要具体而微地进行指导，不需要在诸如研究具体方法、研究具体路径、研究具体内容等方面进行指导。“不离”意指合作导师应该在科研的宏图意旨方面进行指导，需要在研究方向的选择、研究问题的立意，特别是学科领域无解问题，跨学科问题的破解等方面进行指引，更多地采取一种“指引性指导”、“协商式指导”，减少博士后在研究过程中走弯路，缩短研究时间，提高研究效率，敏锐地发现博士后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范式的转换和原创性的假设，使指导的过程成为交往主体间反思的过程。二是合作导师需要鼓励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大胆假设。合作导师需要包容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无知”和“无畏”，既要在常规科学范式中提升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更要敏锐地发现和指引博士后在研究过程中对科学和技术范式的突破，鼓励博士后去解答既有学科观点或科学和技术范式中“不可能”的假设。日本科学家下村修是合作导师指导的典型，1955 年下村修作为名古屋大学理学部平田有机化学研究室的客座研究员参与平田教授的研究团队，平田给他的研究课题是“海萤之萤光素的提纯与结晶”，这个课题是学术界在 1930 年代就提出并希望解决的极难问题，下村修接到这个题目后全身心投入到这个课题，废寝忘食地进行实验和思考，在平田教授的指引下，下村修经过 10 个多月的研究于 1956 年提出了“海萤之萤光素的结晶化”实验成果^②。时隔半个多世纪，下村修因为此项重大发现而获得了 2008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①“不即不离”指导范式的提出受到龚放教授论述“大学与社会关系的理想模式：不即不离”议题的启发（参见：龚放. 试论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2）：126）

^②丁建洋. 日本教授何以获得诺贝尔奖：创新环境建设透视，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2）：37.

附件：稿件事宜联系方式：

- 1、通讯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希望大道中路 1 号 盐城工学院管理学院
- 2、邮政编码：224051
- 3、联系电话：153 7120 2233
- 4、电子邮箱：1786729332@qq. com